《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

邱克　王建中

堪称"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自从比萨作家鲁思梯谦（ Rusticiano ）笔录成书以来，辗转传抄，不胫而走，几乎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它的译本，目前各种手抄本和译本总计已达一百余种。由于原本的所有卷册都出自手抄，各版本之间往往互不相同，歧异百出。特别是人名、地名讹舛脱漏，道里方向也与现代舆图常不相符，从而使研究《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一种专门的课题。因此，不仅必须了解中世纪东方各国历史地理以及其他旅行家的游记，还要掌握当时以至于现在亚洲各民族的语言和风土人情等等。除此之外，尚须对各种版本加以适当的批评，细密的鉴别。有人即说：这些事无论一个人学识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挚，很难兼而有之。尽管如此，几百年来，研究《马可波罗游记》者仍然续起不断，其中荦荦大端者有象颇节、剌木学、玉尔、科尔迭、沙海昂、拜内戴拖、穆尔、伯希和、韩百诗等史学大师。在我国，自从１９０３年魏易首先将此书介绍给我国人民以来，也出现了不少象向达、张星烺、冯承钧、杨志玖、岑仲勉、邵循正这样的著名专家学者。本文即试图通过对《马可波罗游记》诸汉译本之源流、性质及优劣的简略回顾，来总结一下我国学术界对《马可波罗游记》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鉴往知来，从而对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学习与研究任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研究《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首先必须对此书的原文版本源流有所了解。通常人们按照文种的不同，将《马可波罗游记》的版本分为法文系统和意大利文系统。也有人按照版本的不同将之分为原写本、改订本和合订本。学者们对《马可波罗游记》最初是用何种文字写成的问题亦有许多争论。十六世纪有拉丁文说，十九世纪初期又有威尼斯土语说，一直到1827年伯尼（ Baldelli Boni ）在佛罗伦萨刊行了他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与考证，史学界关于其最先文字为古法文的说法遂成定论。

1814年（一说1824年），法国地学会刊印了一种老法文版的游记。该写本的法文极为粗劣。但人名、地名则皆不误，游记中的路程指示明了，较之以前所刊的各种版本甚为精确。原书不分卷，只分为２３２章。这个写本从写作风格上看具有最初笔记的风味，行文完全是闲谈之语，若译文决不致重复无润色，可以由此推断这可能确为马可波罗在热内亚狱中自其口语而笔录的原本。从文法上看，也可证明其为最初之原本。未经后人的修改。简称"地学本"。

此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颇节（Pautheir）对这本版本进行了校订，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这种版本包括有五个写本，当时分别收藏在巴黎，伯尔尼和牛津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其中至少有两个写本已证实经过马可本人的校订或得到其允许而改订。因此，颇节宣称："欲得著书人最初叙述之真相，惟当于此类写本中求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也应指出，颇节的改订草草粗工，而且多他人代为，对于原本只是截略冗章（只有２００章，较"地学本"约减３０余章）及修饰文辞而已。简称"Ｐ氏本"或"原写本"。

十九世纪末，著名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Yule）在考查大批手抄本后，指出："Ｐ氏本"虽有缺陷和粗率之处，却是一个最正确的版本。１８７１年，玉尔结合各种考证编订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两大卷），简称"玉尔本"。１８８９年玉尔逝世后，他的好友高第（Henry Cordier）继续对玉尔的考证进行整理，１９０２年出版了新的改订本。之后，高第又结合最新的科学探险以及版本研究的成果，对玉尔最后的版本增加了一种附录，构成了第三卷，使注解比原文多出若干倍。简称"合订本"。

《马可波罗游记》版本的另一系统称之为意大利文系统。其书在意大利文中称Milione（大概源自马可的另一个名字Emilione）。其中以刺本学（Ramucio）本最为著名，简称"R氏本"，亦称"改订本"。这一版本刊印于１５５９年，曾收入"航海纪程丛书"第二卷。关于"R氏本"的渊源问题各书均语焉不详，至今尚未明了。这种版本的特异之处比其它版本犹为明显。游记中删除了不少的章节，别有许多史实皆新加入，其中改订、新加入的部分许多似乎不尽真确，但其中有马可波罗晚年所增加的日记与余录，如元世祖时奸臣阿合马一章，他种版本皆无，无疑是马可波罗所增。有人认为，"R氏本"是记录中《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的印版之一。虽然有些后来窜入之文，但总的看来比较详备，许多人疑此版本为马可波罗的最后修订本。现代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大都参阅这两种系统的版本，取长补短，主要以法文系统的版本为底本，取其最初之真面目，而以意大利文系体的版本补充进新的材料。

英文版《游记》比较有名的是１８１８年出版的马斯登（Marsden）翻译的典型英文版。这个版本即译自意大利文版本。其译文比较华丽，斐然成章、已经失掉了原有的风格，许多的专家学者对此视如敝屣，但这个版本在英语世界却仍流传较广。

现在，我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汉译版本逐一作一评介。

（一）中国最早的译本。1913年７月北京正蒙书局刊印了中国第一部《马可波罗游记》的译本。译述者为魏易，浙江杭县人。此书由梁启超题笺，共分两册，题名《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魏易在序中写道：《马可波罗游记》"实为欧罗巴人对于我国有著作之始，出版以后，风行一时，至今文明各国，均竞相翻译。数年前曾尝有友询易：此书中国曾有译本否？易答以未详，西友似甚骇异，谓易曰：此书欧美各国重若经典，中国为书中最有关系之国，奈何不急加翻译？易赧然无以答，但日徐当译。"此后，汪康年在北京主办《京报》，约魏易逐日译之，在《京报》连载。不到一年，因触怒权贵，《京报》停止发行。辛亥革命时，魏易逃避天津，曾在闲暇之中考订了书中的今昔地名。1912年７月，

金仍珠约魏易佐办《西报》，才得暇日译数篇、详加注释，到1913年初，全书杀青出版。

《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曾引起较大的反响，中国人第一次读到了这部“世界奇异之书”的全译本。此后不少专家学者对马可波罗进行深入的研究。时过十年，这个译本（特别是注释）就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人们发现，其中复沓舛讹之处比比皆是。著名学者柳诒徵先生批评说：“民国二年，杭县魏易始出马斯登本（指译者选用的版本为马斯登本——引者），自谓择精去冗，为其笺注之语，多浅俚可笑”，他还批评魏易“不读中国典籍，不知中国制度之沿革，地方之名胜，相识蟹此书，即奋笔翻译、哆哆议论，鲜不贻见一橐驼言马肿背之诮矣”①。中西交通史专家冯承钧对魏易的译本亦评价极低：“审其译文，可以说是一种翻译匠的事业，而不是一种考据家的成绩”②。

我以为，对于这种初译本，似应全面给予正确的评价。首先，应当看到译者的历史贡献，早在民国初年即奋笔将这部世界名著介绍给中国人民，并认为“其所记载，皆属信史”。“可以补正史之脱漏，并可于此得当日社会之消息，这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而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一概否定的态度在今天是不足取的。当然，魏易选择的版本为“马斯登本”，本身问题就很多，又没有其它版本详加勘校（只在个别地方参考了“地学本”），加之魏易是一位文学翻译家，缺乏历史学家的训练与素养，因此粗漏之处自所不免。仅举二例：魏易认为，“考《元史》虽无马哥博啰列传，惟其名尝一见于奸臣阿合马传”一条实为当时许多人之误解；二卷十二章纪元旦佳节，述“上下人叩首及地者凡四次”，魏易注云：“此书各家藏本均言四次叩首，但中国旧制必三跪九叩首，讵元制与明清均不同耶”，此亦为胡乱评论之言。

（二）张星烺的两种译本。1924年8月，北京中国地学馆刊印了张星烺汉译并补注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第一卷，作为“受书堂丛书”的第一种。由陈垣题笺，柳诒徵作序。张星烺先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专家，他在留学德国时即开始留心搜集《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版本。从1908年开始他选择亨利·玉尔的英译版本翻译中文。“玉尔本”从分量上看最为广博，其考订之精密，一度曾是标准版本。“是所记载蒙古及各国世系、事迹、制度、风俗、宗教、文字、器用、物产、山川、道里，靡不详搜广征，原原本本，征引吾国史传、地志、碑板、文牍尤夥，益哲种之通儒，其殚心考据往往不下于吾国乾嘉老宿也”（柳诒徵语）。张星烺先生身患肺病，仍然锲而不舍，全力译注。1923年，先将导言在《地学杂志》上分期发表，其中提要钩玄于马可波罗的历史及著述的源流，可以说包举靡遗。张星烺在翻译的同时，还多处补苴罅漏，增写了“中国史书上之马哥孛罗”一章及“元代西北三藩源流略记”。前者就其所知诸书诸条，按照年代先后，条分缕细，编成年表，今天看来，大多已不能成立，因为有关马可的可靠确凿的中文记载至今尚未发现。但张星烺将马可波罗所记元世祖时诸大事，依其年代先后，参证元史，表列

---

① 柳诒徵：《（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序》。

② 冯承钧：《（马可波罗行纪）序》。

出之，成为证实马可波罗来华的重要内证。直到最近还有人提出："马可波罗究竟到过中国没有"的怀疑。我想如果他读过张氏译本及导言，胸中疑窦也许可以涣然冰释。此外，此书尚附有"古代中西交通纪事"、"阿兰人致罗马教皇书之考证"、"《隋书铁勒传》之考证"、"卢白鲁克纪纪中之Segin之考证"（卷一第四十章）等考证文章十余篇。冯承钧先生评价此书说："译文虽然小有舛误，译文补注亦颇多附会牵合，然比较旧译（指魏易译本——引者）可以说后来居上"，然而，玉尔及科尔迭合订本共有四卷，此种译本仅出版导言一册，本书第一卷一册，一直尚未续成全帙。

１９３６年８月，商务印书馆（上海）又出版了张星烺的新译本《马哥孛罗游记》一册，作为"汉译世界名著"的一种。这个版本简称"Ｚ写本"，是意大利拜内戴拖（Benedetto）在１９２６年前后于米兰市图书馆发现，据考证是１７９５年时从一位红衣主教（其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为"Ｚ"）的一本十四或十五世纪的写本上转抄下来的，其渊源基本上属于意大利文系统。这种版本有约三分之一的删节，其余大部分为转录古法文写本的系统，这些段落两种写本几乎完全吻合。另外有不下二百段为法文版本系统所无，其中有五分之二为意大利文版本系统的其它版本所阙佚。经过拜内戴拖教授的悉心考订，这种版本不仅鸠集了各章中诸本的异文，而且从罕见的古钞本中发现了完全簇新的章节。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不可忽视这个重要的版本。

张星烺的新译本有以下几个特点：（１）和玉尔合订本相比，此种版本增益较多，如中译本９２——９３页益柯古斯坦（Icognristan）和都城哈喇卓柯（Carchoco），就是畏吾儿古国和哈喇火者的故墟；中译本３３３——３３６页关于摩尼教的记载，是新增的特别重要的资料；３８７——３８８页言印度马巴尔省的一种"忌刻"风俗，也是说明马可记载详实可靠的又一内征，为其它本所无，据说直到近代此地土人仍然盛行这种风俗。但是，此本脱漏者益为不少，还有同一史事记载不同亦数见之，可以与其它版本互相参见。（２）与旧译本相比，新译文体为白话文。（３）旧译本后附有长篇累牍的注释，详列各家考据学说，而新译本仅为原文，只是在各地名后略为注释今地。有些注释参考了几乎是同时出版的法国沙海昂的版本，如Calashan，玉尔以为即阿拉善，取沙海昂的贺兰山说；Nankin，玉尔以为安庆，从沙海昂之南京（即开封）说更为标准。（４）新译本还有另一番用心，即玉尔合订本陈列各家学说，往往一字的注释有数千字或万余字，专为学者研究历史而作，订价昂贵，超出了一般民众的购买力，也非一般民众必须知晓。因此，经著名出版家王云五的提议，这个新译本作为雅俗共赏的版本，主要面向一般民众，与玉尔合订本并行不悖。

（三）冯承钧译本。1935年２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印行了冯承钧先生译注的《马可波罗行纪》，共分三册。这是我国马可波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译著。向达先生认为，解放前所有《马可波罗游记》汉译本中首推此译注本"最为审慎和最为完备"。１９５４年，中华书局又根据商务原版重新印行。

冯承钧翻译的源本为法国沙海昂（Ａ·Ｊ·Hcharignon）所编订，属于古法文版本

的系统，但增加了“R氏本”的若干篇章。现存的诸如“地学本”之类的法文本所用的文体，几乎是旧文体，很难畅读。沙海昂于1899年来华，任京汉路工程师，后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他利用业余时间，参考了许多重要的版本，特别在中国载籍中所采资料比较丰富。他的功绩主要是将“P氏本”即“颇节本”革新，转为新的法文文体，使读者能通其读；又将各方面的注释采摭甚繁，可以辑诸注释之长，使研究者检寻便利。这在当时各种版本中是很突出的。冯承钧先生译注时，更以其对中西交通的渊博知识，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删削部分大约以第五十九章以后较多，仅第一卷就删削约有六分之一左右。沙海昂编订本原有珠玉沙砾杂陈之嫌，经过冯氏的努力，可以说已经消除。因此，这是一种特别全备和审慎的汉译版本。

沙海昂原书的舛误之处较多。主要由于他对于材料昧于鉴别，执笔之始就深受我国某些学者的影响，沿袭旧说，仍以为马可波罗即为元史记载的枢密副使孛罗，还说：“剌失丁德所志此Polo丞相之大元帅的官号，尤足使人联想他是元史枢密副史的对称”，因此将“蒙古军大元帅”（枢密副使的误译）著录于本书标题之中。特别是他没有见到拜内戴拖的“Z写本”，未能加以参照。伯希和教授曾在1928年撰文对“沙海昂本”加以批评①。此类错误，冯承钧先生在译注时也多加修改，他提出放弃“马哥孛罗”的旧译，而改为“马可波罗”，一直到今天，人们仍然沿用冯氏修订的译名。

（4）译自科曼洛夫编订本的两种汉译本。1936年，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了李季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一册。他所依据的是美国作家曼·科曼洛夫（M·Komroff）所编订的版本。简称“K氏本”。英文编订者认为当时英法学者都特别重视注释，借以证实马可波罗记载的可靠。注解往往比原文多出若干倍，喧宾夺主，，繁锁无比，除少数对地名的今释较为有用外，其余大部分已成为本书的附赘悬疣，而“没有一个版本的出现。把这全部著作当作一项典型的游历纪述”。因此，为使读者得在一种尽可能的正确方式中读到《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奇伟的纪述起见，“K氏本”将一切他认为是障碍的注释和阻止这种纪述前进的材料予以删除，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K氏本”采用的是马斯登1818年自意大利文系统译的典型英文版。怀特（T·wright）于1854年将马斯登的译本编入“博恩丛书”（Bohn's LibrarY）之中。以后又刊入“人人丛书”（Everyman Library），是现今英文版中比较有名的一种版本。比较“玉尔本”来说，这个英文译文典雅华丽，已经完全成为现代文字，有许多不符古人语气之处，舛误极多。但“玉尔本”源出“P氏本”的古法文，具有最初笔记的风味。不仅用语比较粗野。不少今人亦甚费解，所以科曼洛夫认为，改正英文本的错误比修饰法文本“似乎要简单些”，科曼洛夫所作的也正是这种编订工作。

“K氏本”初版于1926年2月，李季翻译的是1932年3月的第九版。这种译本的章节与“马斯登本”已大不相同，许多过分长的章节各分成几个短章，使之与“玉尔本”相符，可供读者按图索骥，查核玉尔和科尔迭的详尽的注释与考证。科曼洛夫几乎将

① 原载《通报》1927—1928年合刊，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编。

一切注译尽行删除，如对中国三四十个地名仅注出两三个。李季在翻译时补入一些注译，尽管有不少牵强之处，而且更多的都无从考证，付之阙如[①]，这种版本在当时诸多优秀版本俱存的情况也可以算作供一般民众阅读欣赏的普及读物。

1981年12月，福建科技出版社出版了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是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汉译本，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截至1982月4月，此书的印数从一万册增加到四万册。关于这部新译本的优劣，已经有人作出评述[②]。这里仅补充几点意见，以供译者参考：

（1）新译本的扉页上写道：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曼纽尔·科姆罗夫英译。此处似乎不确。正如以上所叙，科曼洛夫仅为编订并作序（edited with introduction），其所依据的就是马斯登的典型英文版，何以科氏自己又翻译一通？关于此类错误还有一些，如"译后"记（281页）还将张星烺译注的《马哥孛罗游记》误写为冯承钧释注的《马可·波罗纪行》（应为《马可波罗行纪》）。再如第一卷第二十六章（33页）第四行"必须走八天的路程"。原文（75页）作"六天"，这样才和下一段"第六天结束时，到达一座城镇，……"相吻合。同页还有一处讲一"广阔无垠的大沙漠，长达七八十公里"，原文（75页）为"四五十哩"，似为译者失检。

（2）由于专业不熟等原因，一些常见人名、地名的翻译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如34页讲到"德里厄斯国（Drrius）王"，似乎是德里厄斯这个国家的国王，但实际上是古波斯王大流士（Darius）。还有一些地名，如巴拉奇（34项）似应译作巴里黑；布鲁伊斯（114页）应为不鲁郁斯，雅歧（哈喇章省会，144页）应为押赤（或鸭赤、鸭池）。

（3）《马可波罗游记》是一部中世纪游记，但新译本中却出现了"公里"、"公斤"等现代公制单位。（公制于十八世纪末在法国首创），如189页"用相等于一个威尼斯银币的钱，可以购到三点六公斤生姜"。原为338页为"eigby pounds weight of fresh ginger"，即可以换几十磅鲜姜。41页还谈到高原上"燃烧点很低"，我们以为也和整个中古游记的风格不谐调。

（4）这部新译本还有许多地方尚待进一步推敲、加工。如第192页有这样一段话：

> （在泉州港）船舶装载商品后，运到蛮子省各地销售。运到那里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拙，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

这里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就此笔者提出一种译法，以就求于诸位同志：

那里进口胡椒的数量极大。相比之下，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之需的胡椒数量就减少得可怜，证怕尚不到它的百分之一。

* * *

以上我们对《马可波罗游记》的汉译版本作了介绍和比较，希望对这部名著在中国的

① 孟柑：《评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天津益世报》1936年11月19日。

② 《评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载《读书》1982年第十期。

研究历史提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总结我国过去研究马可波罗的成就和问题，可以不断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将前人的终点当作自己的起点，去伪存真，以推动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不断发展。

附 录：《马可波罗游记》汉译版本一览表

译者	题名	出版社	出版年月	卷册数	版本渊源
魏易	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	北京 正蒙书局	1913年	铅印本二册	Marsden
张星烺	马哥孛罗游记导言 第一卷	北京 中国地学馆	1424年	铅印本二册	Yule
冯承钧	马可波罗行纪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年2月	铅印本三册	Charignon①
李季	马可波罗游记	上海 东亚图书馆	1934年4月	铅印本一册	Komroff
张星烺	马哥孛罗游记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年8月	铅印本一册	Benedett
陈开俊、戴树英、刘贞琼、林键	马可波罗游记	福建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年12月	铅印本一册	Komroff

① 冯译本最早由北平那世宝书店于1924—1928年出版。

泉州最近发现的印度教“舞王”雕像

黄世春　杨钦章

今年七月，泉州考古工作者黄世春在晋江池店发现了印度教破坏神“舞王”湿婆雕像。(封三图1)该石雕嵌筑在兴济亭的壁龛上，当地群众长期误认为是佛教艺术品中的观世音。

石雕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显系辉绿岩雕成，高四十八厘米，广六十六厘米，厚二十二厘米，浮雕着莲座上的四臂神湿婆，头戴孔雀羽做成的扇形冠。左上手握达莫如鼓，右上手抓活蛇；左下手持长矛，右下手拿铃铎，大神一脚踩着横卧在地的巨魔（孟加拉人所称的伽俚），巨魔用手撑住长矛徒然挣扎着。浮雕表现了湿婆的神力；脚踩魔鬼欲作舞蹈之状，意味着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在印度教徒眼里，湿婆神是一个复合的神祇，被称为战胜毁灭之神、苦行之神和舞蹈之神，代表着生与死、变化、衰亡和再生的力量，在供奉、文学和艺术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其造像是多样化的，因为湿婆代表了不可驾驭的大自然力量。

印度教和佛教同是源于古代印度，笈多王朝以后，佛教在印度逐渐衰微，南亚次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主要是印度教，其中湿婆派在今日的南印度是最有势力的派别，反映湿婆崇拜的“舞王”雕像是南印度雕刻中令人触目的特色之一。据我们的初步分析，这尊浮雕很可能就是元代兴建的泉州印度教寺的嵌板石，元末寺庙遭到破坏后被挪移到距离泉州城区仅六公里的池店。